

浅论容闳的教育救国理想和实践

田 龄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历史系,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容闳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普及西式教育, 提高全民素质, 积极倡导和促成幼童赴美留学, 开一代新风, 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容闳; 教育救国; 留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133(2003)03-0088-03

容闳(1829—1912), 原名达萌, 字纯甫, 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生于澳门, 1841年就读于香港马礼逊纪念学校, 1847年赴美, 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 1854年毕业, 是中国最早赴美的留学生之一, 也是耶鲁大学的首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是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 他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富强, 是教育救国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代表作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译为《西学东渐记》。

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华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不断寻求和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容闳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容闳幼年生活在国内, 少年时就开始接受西式教育, 西方国家的强盛和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同当时国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国家的贫困落后的鲜明对比, 使他在美留学期间就树立了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技术运用于改造东方文明的远大理想, 他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写到:“予当修业期内, 中国之腐败情形, 时触予怀, 迨末年而尤甚, 每一念及, 辄为之怏怏不乐, 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逾。盖既受教育, 则予心中理想既高, 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1](P11)}容闳很早就从自身所受的教育中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和价值, 意识到了科学和教育与国家繁荣富强之间的必然联系, 从而把“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联系在一起, 认定只有引进西学,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 提高全民素质, 才是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 不受列强欺侮的唯一出路。而这一切, 只有依靠发展西式教育, 并结合派出学生出洋留学, 培养造就中国的从事改革和国家近代化所急需的各种人才才能得以实现。他说:“使予之教学计划果得实行, 藉西方之文明, 以改良东方之文化, 必可使此老大帝国,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P67)}这种思想, 在当时盲目自大, 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学术思想嗤之以鼻的中国无疑是先进的、有远见的和难能可贵的。

1854年容闳从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耶鲁大学毕业, 在美国稍做停留, 即抱着“为中国谋利”的思想于1855年回国。容闳从美归国前, 清政府已同各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回国后的社会现实更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 他开始不断寻求各种机会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其后的几十年中, 他先后向洪仁、曾国藩、丁日昌、张之洞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的建议和具体措施, 这些建议集中体现了容闳教育救国的理想和计划。

1860年11月, 容闳抱着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以及希冀依靠太平军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收稿日期: 2003-6-12

作者简介: 田 龄(1968—), 女, 陕西西安人,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历史学硕士。

和计划的幻想同两位美国传教士一起来到了南京,拜见了干王洪仁玕,并提出了七项建议,与教育有关的是其中的二、三、六、七条,即“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之军官”;“建立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设立各种实业学校”。^{[1] (P36-57)} 这些内容占了容闳所提建议的半数以上,是七项建议的核心,既涉及到普通民众教育,又涉及到了军事教育和实业教育。建立武备学校和海军学校无疑是出之于容闳有感于当时外国军事势力的不断渗透,中国军队指挥和管理水平极度落后的现状,迫切希望用国外的军事思想和教育模式,培养国家急需的具有现代军事意识并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新型军事人才;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培养各类科学技术人才,是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出路。而第六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虽与容闳自幼就“入西塾”,接受教会教育的背景有关,但其根本仍是希望在中国建立起新的教育体制,并通过学习基督教的经典,学习宣传西方的人文思想。从这些建议中,我们不难看出容闳拳拳的爱国之情及希冀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急迫心情。然而,由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局限性,容闳的建议没有也不可能被采纳。

太平天国之行未能实现容闳的教育计划,使容闳颇有些懊丧,但他并没有气馁,旋及,他又继续寻找机会以实现自己的理想。1863年,经友人张斯桂、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到安庆谒见了曾国藩,曾国藩委派容闳筹办机器总厂,并赴美购买机器。1865年容闳将所购机器启运回国,在上海设立机器厂,即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同年,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在机器厂附设兵工学校,“授以机械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1] (P85)} 曾国藩采纳了这一意见,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兵工学校。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为中国最先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机械技术人才。这是容闳第一次得以部分地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后来,他也欣慰地回忆到:“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1] (P85)}

容闳一生的最大贡献是极力促成幼童赴美留学。实际上,在容闳回国之始,即有派留学生出洋深造的愿望,然而却苦于身单势孤,没有机会。在结识曾国藩和丁日昌等朝廷大员之后,容闳终于等来了他认为可以实现他梦寐以求计划的机会。1867年,在向丁日昌提交的条陈四则的第二条中,他明确提出了政府应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的建议。这是条陈四则中容闳最为着意之事,是他建议的核心。他说:“此条陈之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1] (P75)} 此条陈四则由丁日昌转交文祥后,恰逢文祥服丧,无心顾及此事,这些建议和措施未能得到采纳和响应。

1870年,曾国藩和丁日昌赴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任翻译。容闳又等来了一次实现他宏伟计划的机会。他又向曾国藩提出派留学生一事。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高潮,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极端匮乏,因此,容闳的建议,最终得到了曾国藩和丁日昌的支持。1871年冬,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计划。经李鸿章具体经办,首批三十名幼童终于得已于1872年8月赴美留学。容闳是这批幼童的副监督,具体负责他们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容闳感慨到:“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为一堂”。^{[1] (P90)} 按照容闳的计划,“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为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定为永例,每年派出此数”。^{[1] (P86-87)} 1873、1874、1875年又分别选派了三十名幼童进入美国的中小学学习。按当初的计划,这些幼童将在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3] (P867)} 然而,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这120名赴美留学的幼童,没有能够完成原定的十五年的留学计划,于1881年中途撤回,他们大多数都在大、中学肄业,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3] (卷34, P167)} 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清政府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考试,“试以所学各艺,均能融会贯通,各有心得”,“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4] (P167)} 这批人多数成长为后来科技、教育、文化、外交乃至军政工商界的精英,为中国近代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的贡献,其中如爱国工程师詹天佑,1905年独立负责修建的京张铁路,在世界上为中国科技人员争得了荣誉。他们的事迹也已载入史册,被人们永久怀念。这次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天折,容闳深受打击,被看成是他一生之中最为不幸之事。然而这次打击使容闳深刻地意识到了仅靠发展教育,还远远不能实现他的救国理想,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中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之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1] (P110)} 所以,他随即又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洪流中。

这次幼童赴美留学,不仅是容闳教育救国理想和实践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容闳后来回忆的那样,它“于中国二千年历史当中,特开新纪元矣”^{[1] (P91)}。它拉开了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大批留洋的序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选派留学生去西方国家系统地学习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知识,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冲破了封建教育的枷锁和封建顽固派的阻挠,打破了封建闭关自守的旧思想,促使了学习自然科学风气的高涨,培养了各行各业急需的各类人才,为我国的近代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学生在美国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以及西方人的价值观,对于进一步在国内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风气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冲破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的藩篱,推广和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民主思想也是极为有益的。

容闳教育救国的理想也充分体现他独特在教育思想上。他认为使女子同男子一样接受平等的教育,也是使国家富强的重要环节。他认为让妇女接受教育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下一代的文化素质,他说“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胎教’开始,好好来教育他(她)们,”“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3] (P99)}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要想使中华民族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受外敌欺凌,必须加强对妇女的教育,从搞好家庭教育提高子女的智力水平入手,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这些见解,是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的挑战,目光深远,意义重大,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容闳还特别注重对国民的素质教育,他对中国传统的中庸无为的教育思想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提倡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使他们不甘屈辱,勇于反抗外来压迫和侮辱,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和自尊。他在《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回忆·附录》中明确指出“自从上海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借地之后,在其管辖区内从未听说过任何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侮辱时,敢于毫不畏缩地挺身保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骄傲和专横。”“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2] (P43)}这些观点,体现了容闳对当时的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容闳希望借助新式教育,塑造全民健康人格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也是他教育救国理想的一部分,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对当今社会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外国侵略者恣意横行的近代中国,容闳高瞻远瞩,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信念和理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时弊,通过向西方学习,发展西式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全民素质,以使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道路的教育救国措施,是先进的,应该肯定的,而他为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理想殚精竭虑,四处奔走的不懈努力是令人钦佩的。虽然,由于容闳对当时社会本质认识的不足,他的教育救国理想和实践活动为他所处的时代所不容,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根本思想原则相违背,遭到了残酷扼杀,然而,他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救国理想和实践,顺应了历史潮流,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容闳,徐凤石,等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2] 容闳,王蓁译.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回忆·附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 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M].台湾:传记文学,1979.
-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5]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